

地权稳定性如何影响农民的进城选择?

翁艺青, 胡新艳

(1. 华南农业大学 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2. 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摘要: 就近城镇化是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方向之一。以往农民在县域定居多归因于户籍制度和生活成本等因素, 但却难以解释在户籍制度松动和经济水平提高的情况下农民就近进城的基本趋势。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村社中, 农民将土地视为“命根子”, 地权稳定性成为农民行为决策的重要准则。因此, 本文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 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地权稳定性对农民进城路径选择的影响, 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基准回归结果表明, 农地确权对农民就近进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地确权产生的财产功能效应和生产功能效应分别给农民带来了“离乡非农就业”“留乡守土务农”两种激励导向, 而就近进城则成为农民选择的兼容性策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 农地确权更能促进东中部地区农民和家庭女性劳动力占比低的农民选择就近进城。机制分析结果表明, 在农地确权情况下, 农民农业兼业的意愿增强, 从而促进其就近进城。笔者认为, 农民进城路径选择隐含着深刻的产权经济学含义, 这有助于增进我们对以县域经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策略的理解。

关键词: 地权稳定性; 农地确权; 就近进城; 农业兼业

中图分类号: F30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76X(2023)10-0044-09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发生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内移民”^[1], 成为激发中国经济发展活力的中坚力量。但是, 学术界关于中国走什么样的城镇化道路问题一直存有分歧, 并存在三种观点: 一是以陆铭^[2]为代表的大城市论; 二是以厉以宁^[3]为代表的中等城市论; 三是以辜胜阻等^[4]为代表的小城镇论。多个以“城乡融合发展”为主旨的中央文件所释放的政策信号, 均表达了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战略。必须强调, 宏观政策导向必然有其微观基础, 需要关注农民进城行为选择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和关键意义。由此提出的问题是, 农民进城选择受什么因素影响? 其行为响应与国家宏观政策导向是否一致?

收稿日期: 2023-08-22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及其协调研究”(71933004);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特别委托项目“农民共同富裕的生态逻辑及其实现路径”(GD22TWCXGC08);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特别委托重点项目“清远高质量发展研究”(GD23WTC02-08);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地确权政策如何影响政治信任”(2023A1515010881)

作者简介: 翁艺青(1996-), 女, 福建漳州人, 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农业经济和制度经济研究。E-mail: yiqing9696@126.com
胡新艳(通讯作者)(1972-), 女, 湖南长沙人, 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农业经济和制度经济研究。E-mail: huxyan@scau.edu.cn

学术界广泛关注了影响农民进城选择的因素,其中,户籍制度和经济水平被视为重要因素。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使得农民在大城市落户困难^[5],而且,在城市中农民属于非精英阶层,就业场域基本为次级劳动力市场,待遇差、稳定性弱、易受市场波动影响。这就造成了大城市生活成本与农民薄弱的财富积累能力不协调^[6],大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也会倒逼进城农民选择县域。因此,经济因素被视为农民进城路径选择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7]。但是,随着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和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逐步增加,上述两个因素却难以解释为何当前农民进城呈现出县域趋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表明,2022年,城镇常住人口达到9亿多,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5.22%。其中,县域范围内农民工总人数为1.46亿人,比上年增加了1500万人^[8]。

经典产权理论强调农地产权制度对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影响,但是经验证据上存有分歧。从国外研究来看,Do和Iyer^[9]基于越南1993年《土地法》的实施和De Janvry等^[10]基于墨西哥农地确权等的研究均表明,农地确权促进了劳动力非农转移。但是,De Brauw和Mueller^[11]对埃塞俄比亚的研究表明,缺乏农地确权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劳动力非农转移。与此类似,基于中国农地确权研究的经验证据也并非一致。许庆等^[12]认为,农地确权强化产权保障,激励劳动力非农转移。但洪伟杰和胡新艳^[13]与张莉等^[14]的研究表明,农地确权强化了地权稳定性,促进农民务农,抑制其外出务工。而上述研究并未关注农地确权如何影响农民非农转移地点的选择问题。笔者通过整理相关资料分析发现,新一轮农地确权启动后,2018—2022年5年间本地农民工增长人数和增长率均大于外地农民工的增长。这为农地产权制度变革影响农民进城地点选择提供了初步的统计证据。鉴于此,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农地确权从法律层面上维护农地产权稳定性,这将如何影响农民进城地点的选择?其背后的作用机理是什么?有何政策启示?

与同类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首先,笔者基于转移地点维度分析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行为。目前对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的研究更多集中在转移的数量和性别等,在转移地点选择上仍然缺乏系统的探讨。因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农民转移地点选择的影响因素。其次,本文将受地权改革影响下农民的非农转移地点选择行为与宏观层面国家城镇化战略结合起来进行讨论。在县域城镇化研究上,宏观层面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微观层面的行为选择关系着宏观政策实施的效果,本文能为宏观层面的城镇化研究补充个体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农地制度是一个国家基础性、全局性的制度安排。Dixon^[15]认为,土地是人类迁徙的动力机制,人口转移是土地的函数。但是,土地资源之上所附着的产权权利不同,会产生不同的激励效果。从理论上讲,农地确权对劳动力非农转移存在两种相反的作用路径。

一方面,农地确权带来产权稳定性,降低农民失地风险和成本,从而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与建立农地所有权的发达国家不同,许多发展中国家农地产权是通过土地临时使用而建立的产权权利。发达国家农地产权形态更多是私有产权,而在发展中国家并未引入私有农地产权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农地产权安全需要通过农地的生产性使用来维护。若农民将农地闲置或流转给他人,他将存在失地风险,由此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导致劳动力低效地与土地捆绑在一起。从这个角度看,农地确权强化了地权稳定性,对农民自身的农地财产具有“压舱石”的作用,从而地权稳定性提高可促进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比例的提升^[16]。因为农地确权明确了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了更稳定、更明确的法律保障。当农地被违规占用或被侵犯时,农民可依法维权,进而减轻农民丧失土地的担忧。尤其是在农业生产过密化和就业机会匮乏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农地确权更会促使农民外出谋求更好的生存和发展机会,从而强化农地确权的村庄推力,推动农民走出村庄,流向城市。可见,上述作用路径强调的是农地确权如何影响农民的失地风险和加大成本,进而影响劳动力转移,侧重于从农地财产功能释放角度进行的分析。另一方

面, 农地确权带来的产权稳定性将激励农民留乡守土务农, 从而抑制劳动力非农转移。地权稳定性影响农民对农地生产功能的利用程度。产权制度确立与否激发着农民的资源投入程度和资源利用效率。产权不安全降低农民的投资积极性和投入决策精度^[17]。反之, 农地确权赋予农民产权安全性保障, 降低农民农业长期投资被征收随机税的风险^[18]; 同时, 农地确权明确产权主体为信贷供给提供了有力的抵押品, 减轻农民在信贷市场的劣势, 从而促使农民将农业投资意愿转化为行为^[19]; 而且, 农地确权促进农地流转, 这有利于农业经营者进行土地规模经营, 促使其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中获利, 进而激励农民农业投资经营^[20]。可见, 农地确权可增强产权激励、信贷供给和土地流转等, 提高农民农业投资意愿, 激励农民留乡守土务农。总之, 在农地确权下, 农地产权的强化和稳定会增加农业投资收益, 鼓励农民加强农业投资, 开展农业经营。显然, 上述作用路径强调的是农地确权如何影响农业经营, 进而影响劳动力转移, 即农地的生产功能。

可见, 地权稳定性提升能够减少农民失地风险, 激活土地的财产功能, 增加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但与此同时, 农地确权也会对农业生产活动产生激励作用, 激励农民留乡守土务农, 进而降低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意愿。在此情形下, 农民会合理选择进城方式, 实现家庭劳动力的有效配置以增加家庭收入。显然, 农民是否进城、进什么城是基于自身福利最大化的选择^[21]。劳动力就近进城在物理空间上表现为无跨省市的短距离迁徙, 以周边新型乡镇和县城为主体的转移方向选择, 实现非农就业^[22]; 而因地理空间便利劳动力可在城乡之间流动, 改变以往异地城镇方式造成的候鸟式人口迁移, 实现“亦城亦乡”“亦工亦农”的城镇化, 这既可与农村社会保持有机联系, 也可保留和利用现有的农村资源。此外, 在非农劳动力市场上, 农民因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和职业技能不高造成农民在非农就业上呈现工作地点和时间不固定, 进而导致其收入发生波动。此时农民生计策略的理性选择除了完全以地为生的纯农业经营和完全抛弃土地的纯务工之外, 还存在兼业经营。而农地确权在生产功能上保障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剩余控制权, 在兼业激励和农业投资经营的可实现性二者共同作用下, 促进农民开展农业兼业经营。因此, 在农地确权情形下, 农民为平衡非农就业与农业经营, 将选择就近以县域为主要进城目的地, 以避免“大城”异地迁徙下农户分离所造成的福利损失和幸福感降低。基于此, 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 农地确权促进农民选择就近进城。

假设2: 农地确权通过激励农民农业兼业, 促使其选择就近进城。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中山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社会科学调查中心2014年和2016年所开展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选取29个省份、124个地级市, 包含个体、家庭和社区(村)等多个层面的数据集。本文重点考察地权稳定性对农民进城地点选择的影响, 故选取农村地区数据集作为样本数据。为此, 本文将2014年和2016年数据进行处理, 形成两期平衡面板数据, 其中, 农民有效样本数为11 326个, 村庄有效样本数为164个。

(二)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 就近进城

就近进城用县域内转移劳动力数占家庭总劳动力数的比值衡量, 即将家庭劳动力就近转移率作为就近进城的测度指标。

2. 解释变量: 农地确权

本文采用是否确权且颁发承包经营权证书作为农地确权的测度指标。

3. 机制变量: 农业兼业

本文采用是否为农业兼业户作为农业兼业的测度指标。

4.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马俊凯和李光泗^[23]的研究并结合实际需要，选取家庭层面和村庄层面可能影响个体进城路径选择的控制变量。家庭层面控制变量包括家庭劳动力、家庭总收入、家庭农业收入、家庭承包地面积和家庭农机具配备等；村庄层面控制变量包括村庄农用地面积、村庄农地征用、村庄农地抛荒、村庄宗族团结和村庄非农经济等。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 量	定 义	均 值	标准差
就近进城	县域内转移劳动力数占家庭总劳动力数的比值	0. 741	0. 344
农地确权	已确权且颁发承包经营权证书：是=1，否=0	0. 516	0. 500
农业兼业	是否为农业兼业户：是=1，否=0	0. 890	0. 312
家庭劳动力	家庭男性劳动力占比	0. 490	0. 258
家庭总收入	家庭年总收入（元）的自然对数	42 354. 810	60 809. 670
家庭农业收入	家庭农业总收入（元）的自然对数	11 694. 740	26 824. 300
家庭承包地面积	家庭耕地承包面积（亩）的自然对数	7. 075	46. 393
家庭农机具配备	家里是否有大型农机具：是=1，否=0	0. 029	0. 169
村庄农用地面积	村庄农业用地总面积（亩）的自然对数	11 374. 970	23 730. 670
村庄农地征用	是否被政府或企业征用或租用过：是=1，否=0	0. 480	0. 500
村庄农地抛荒	村庄是否有土地弃耕抛荒现象：是=1、否=0	0. 362	0. 481
村庄宗族团结	很不团结=1，不团结=2，难说=3，团结=4，非常团结=5	4. 136	0. 617
村庄非农经济	村庄是否有非农经济：有=1，没有=0	0. 289	0. 453

（三）描述性证据

本文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给出了两种农地确权情形下农民就近进城选择的组间差异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2014年已确权组和未确权组就近进城均值分别为0. 693和0. 668；2016年已确权组和未确权组就近进城均值分别为0. 832和0. 765，已确权组农民就近进城选择均值均大于未确权组。由于农地确权政策实施随时间不断推进，因而在2016年确权工作进度快于2014年的情形下，2016年已确权组农户就近进城比2014年更多。以上统计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可能具有促进农民选择就近进城的作用，但仍需建立计量模型加以验证。

表2 两种农地确权情况下农民就近进城选择的组间差异

变 量	2014年				2016年			
	已确权		未确权		已确权		未确权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就近进城	0. 693	0. 348	0. 668	0. 353	0. 832	0. 299	0. 765	0. 343

（四）模型构建

本文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两期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整理成平衡面板数据，建立个体和年份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地确权对农民就近进城选择的影响。模型构建如下：

$$urba_{it} = \beta_0 + \beta_1 X_{it} + \beta_2 S_{it} + \lambda_i + \mu_t + \varepsilon_{it}$$
 (1)

其中， $urba_{it}$ 为农民就近进城， X_{it} 为农地确权， S_{it} 为相关控制变量， λ_i 为个体固定效应， μ_t 为年份固定效应， ε_{it} 为随机误差项。

为检验农地确权对农民就近进城选择影响的作用机制，模型构建如下：

$$M_{it} = \varphi_0 + \varphi_1 X_{it} + \varphi_2 S_{it} + \lambda_i + \mu_t + \varepsilon_{it}$$
 (2)

其中， M_{it} 为机制变量农业兼业，其余变量的定义与模型（1）相同。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表3给出了农地确权对农民就近进城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其中，列（1）为控制个体和年份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列（2）为控制个体和年份固定效应并加入家庭层面和村庄层面等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由表3可知，列（1）和列（2）均表明农地确权正向影响农民就近进城路径选择，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以上的结果说明，农地确权会促进农民选择就近转移的进城方式。假设1得证。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 量	(1)	(2)	变 量	(1)	(2)
农地确权	0.032*** (0.008)	0.029*** (0.008)	村庄农地抛荒		-0.062*** (0.009)
家庭劳动力		-0.051*** (0.016)	村庄宗族团结		-0.021*** (0.007)
家庭总收入		-0.016*** (0.004)	村庄非农经济		0.027*** (0.010)
家庭农业收入		0.001 (0.004)	个体FE	控制	控制
家庭承包地面积		0.004 (0.004)	年份FE	控制	控制
家庭农机具配备		0.005 (0.021)	常数项	0.761*** (0.006)	1.137*** (0.061)
村庄农用地面积		-0.010*** (0.003)	观测值	5 663	5 663
村庄农地征用		-0.038***0.008)	Pseudo R ²	0.003	0.021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同。

（二）内生性问题处理和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问题处理

尽管农地确权政策由政府自上而下实施，可视为一个外生变量^[24]。但考虑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政府可能采用“先易后难”的选择性策略执行该政策会产生自选择问题。谨慎起见，本文使用县内其他村庄农地确权均值作为工具变量重新估计模型（1）。由于同一县内农地确权政策执行具有相对一致性，因而工具变量——县内其他村庄农地确权均值必然与该县农户是否完成确权相关，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要求；而县内其他村庄的农地确权情况不会直接影响农民就近进城选择行为，因而也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要求。表4给出了内生性问题检验结果。其中，列（1）汇报的是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列（2）汇报的是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表4 内生性问题检验结果

变 量	(1)	变 量	(2)
	第一阶段：农地确权		第二阶段：就近进城
县内其他村庄农地确权均值	1.021*** (0.022)	农地确权	0.091*** (0.01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个体/年份FE	控制	个体/年份FE	控制
一阶段F统计量（P值）	2 062.820*** (0.000)		
Anderson Canon. LM（P值）			1 514.060*** (0.000)
Cragg-Donald Wald F统计量			2 062.820
DWH检验P值	0.000***		
观测值	5 663		

由表4可知，IV-2SLS估计的DWH检验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拒绝外生性的原假设，说明模型存在内生性问题。列（1）中工具变量第一阶段F值为2 062.820，远大于10，这表

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工具变量法的第二阶段中 Anderson Canon. LM 检验显著拒绝原假设，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大于 10% 水平的 Stock-Yogo 检验临界值，这说明不存在模型识别不足问题。第一阶段中工具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要求。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农地确权正向影响就近进城路径选择，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工具变量模型结果进一步验证了基准结果的稳健性。

2.遗漏变量问题

基准回归结果可能因遗漏变量产生结果偏误，通过加入控制变量的方法能降低这一偏误的可能性。已有研究表明，制度的效用不仅仅与当下具体的影响因素有关，也与制度遗产和过往经历相关，历史的影响作用不能被排除在外。而且，鉴于农地处于封闭的农村社会场域下，地权稳定性不仅取决于国家法律的保障、维护，也受到传统农村社会场域中的习俗和内部秩序的影响。损失与收益相比带来的心理冲击往往更大，农地调整经历和征地等给农民留下土地损失的痛苦记忆，形成其对农地产权安全的心理担忧。程令国等^[25]也证实农地调整经历削弱了农民对新一轮确权颁证的制度信任，在农地调整的特定情境依赖下，可能导致农地确权政策效果的差异。因此，本文加入农地调整经历和家庭土地征用经历考察农地确权对农民就近进城路径选择的影响。其中，农地调整经历使用“2003 年以来村庄是否发生过农地调整”进行衡量；家庭土地征用经历使用“您家是否有土地被征用”进行衡量，两者都是二值虚拟变量，是=1，否=0。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由表 5 可知，加入新控制变量后，农地确权的系数值和显著性水平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验证了基准结果的稳健性。

表 5 遗漏变量问题检验结果

变 量	(1)	(2)	(3)
农地确权	0.029*** (0.008)	0.029*** (0.008)	0.029*** (0.008)
农地调整经历	0.021** (0.010)		0.021** (0.010)
家庭土地征用经历		-0.051** (0.023)	-0.051** (0.02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年份 FE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149*** (0.061)	1.137*** (0.061)	1.148*** (0.061)
观测值	5 663	5 655	5 655
Pseudo R ²	0.021	0.021	0.021

(三) 异质性分析

1.地理区位异质性

农地确权因地区差异可能对农民就近进城选择产生不同的影响。本文将所有样本按调查省份地区分布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开展实证检验。表 6 给出了不同地区农地确权对就近进城的影响结果。列（1）和列（2）回归结果表明，农地确权系数为正，且在 1% 的水平上显著，列（3）的农地确权系数不显著。可见，农地确权更能促进东部地区 and 中部地区农民选择就近进城。其原因可能是，西部地区县域经济水平较为落后，限制了农民就近转移。

2.女性劳动力占比异质性

孟晓志和李尚蒲^[26]的研究表明，性别是影响城镇化路径选择的重要因素。本文将女性劳动力占比低于 50% 界定为女性劳动力占比低，反之，为女性劳动力占比高，进而分析女性劳动力占比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影响。表 6 的检验结果表明，在女性劳动力占比低的家庭中，农地确权对就近进城路径选择的促进作用更强。其可能的解释是，男性劳动力务农的机会成本高，农业兼业是其具有经济理性的最佳选择之一。

表6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 量	(1)	(2)	(3)	(4)	(5)
	地理区位异质性			女性劳动力占比异质性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女性劳动力占比低	女性劳动力占比高
农地确权	0.046*** (0.013)	0.054*** (0.015)	-0.023 (0.018)	0.038*** (0.009)	-0.003 (0.01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年份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1.367*** (0.095)	0.964*** (0.112)	1.168*** (0.121)	1.154*** (0.071)	1.253*** (0.127)
观测值	2 177	1 984	1 502	4 425	1 230
Pseudo R ²	0.036	0.031	0.033	0.024	0.066

（四）机制分析

前文理论分析表明，农地确权强化了土地财产保障功能，促进农村劳动力外出谋求更多的经济收入，但又因农户在非农劳动力市场上处于劣势地位，其非农收入保障性不足。因此，农地确权的农业投资激励会激发农民开展农业兼业的生计活动。农户为了兼顾“离乡非农就业”“留乡守土务农”两种激励导向，就近进城则成为他们的理性选择。表7给出了上述作用机制的回归结果。由表7可知，农地确权正向影响农业兼业选择，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农地确权会通过促进农民农业兼业进而激励农民就近进城。

表7 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变 量	农业兼业	变 量	农业兼业
农地确权	0.023*** (0.007)	常数项	0.944*** (0.052)
控制变量	控制	观测值	5 663
个体/年份FE	控制	Pseudo R ²	0.012

五、结论与启示

长久以来土地是农民生存之本，是重要的生产资料。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民进城务工成为其寻求生计策略的主要途径，但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属于次级劳动力，福利低、保障性差。因此，即使农民单纯以地为生的情形发生改变，这也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其对土地的认知，仍会将土地视为自己的“命根子”。无论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还是选择进城务工的农民，他们往往会将土地作为就业迁移行为决策的首要考虑因素。微观农民就业迁移行为直接影响国家宏观层面的城市化道路。但是，一直以来，学术界关于中国走什么样的城镇化道路存在分歧。近年来国家政策均表达了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战略。必须强调，宏观政策导向必然有其微观基础，需要关注农民进城行为选择所起的基础性作用和关键意义。鉴于此，本文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两期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农地确权对农民进城路径选择的影响。得到的主要结论是：

理论分析表明，地权的财产功能和生产功能分别给农民带来了劳动力流出村庄和农业经营激励的不同选择倾向，导致农民选择就近进城来平衡此矛盾。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对农民就近进城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随着农地确权的完成，其将促进农民选择就近县域作为其主要进城路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农地确权对农民选择就近进城的影响在东中部地区更为显著，而且对女性劳动力占比低的农户家庭影响更大。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地确权激励农民选择农业兼业，从而促使其选择就近进城。

上述实证结果的启示是：从理论上来看，应重视农民进城路径选择所隐含的产权经济学逻

辑。农地制度是劳动力非农转移的关键影响因素,农地确权促进农民选择就近进城,这说明在农民进城路径选择中地权制度起到重要的作用。从实践上来看,应重视产权制度变革带来的城镇化道路发展效应。农地确权对劳动力非农转移地点的选择,其基本逻辑在于农民对农地财产功能和农地生产功能之间的双重激励导向,对于需要兼顾土地财产功能与生产功能的农民而言,将会促进其选择就近县域。这有利于推进国家宏观层面以县域经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发展。

参考文献:

- [1] 常进雄,朱帆,董非.劳动力转移就业对经济增长、投资率及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J].世界经济,2019,42(7):24-45.
- [2] 陆铭.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3] 厉以宁.中国道路与新城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4] 辜胜阻,李华,易善策.均衡城镇化:大都市与中小城市协调共进[J].人口研究,2010,34(5):3-11.
- [5] 刘传江,程建林.双重“户籍墙”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J].经济学家,2009(10):66-72.
- [6] 张勇,包婷婷.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进城定居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9(10):14-19.
- [7] 周亮,车磊,孙东琪.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及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2019,39(6):97-107.
- [8] 孙榕.县城,如何推动农民就地变市民?——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中国农业风险管理研究会会长张红宇[J].中国金融家,2022(7):88-90.
- [9] DO Q T, IYER L. Land titling and rural transition in Vietnam[J]. Economic development & cultural change, 2008, 56(3):531-579.
- [10] DE JANVRY A, EMERICK K, GONZALEZ - NAVARRO M, et al. Delinking land rights from land use: certification and migration in Mexico[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 105(10):3125-3149.
- [11] DE BRAUW A, MUELLER V. Do limitations in land rights transferability influence mobility rates in Ethiopia?[J].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2012, 21(4):548-579.
- [12] 许庆,刘进,钱有飞.劳动力流动、农地确权与农地流转[J].农业技术经济,2017(5):4-16.
- [13] 洪炜杰,胡新艳.地权稳定性与劳动力非农转移[J].经济评论,2019(2):34-47.
- [14] 张莉,金江,何晶,等.农地确权促进了劳动力转移吗?——基于CLDS数据的实证分析[J].产业经济评论, 2018(5):88-102.
- [15] DIXON G I J. Land and human migrations[J].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1950, 9(2):223-234.
- [16] FENG S, HEERINK N, RUBEN R, et al. Land rental market, off-farm employment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Southeast China: a plot-level case study[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10, 21(4):598-606.
- [17] BANERJEE A, GHATAK M. Eviction threats and investment incentive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08, 74(2):469-488.
- [18] BESLEY T. Property rights and investment incentive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Ghana[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5, 103(5):903-937.
- [19] BESLEY T, BURCHARDI K B, GHATAK M. Incentives and the De Soto effect[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2, 127(1):237-282.
- [20] WANG Y, LI X, LI W, et al. Land titling program and farmland rental market participation in China: evidence from pilot provinces[J]. Land use policy, 2018, 74(5):281-290.
- [21] 罗必良,洪炜杰.城镇化路径选择:福利维度的考察[J].农业经济问题,2021(9):5-17.
- [22] ZHU Y. New paths to urbanization in China: seeking more balanced patterns[M].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1999.
- [23] 马俊凯,李光泗.农地确权、要素配置与种植结构:“非粮化”抑或“趋粮化”[J].农业技术经济,2023(5):36-48.
- [24] 钱龙,冯永辉,钱文荣.农地确权、调整经历与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来自广西的经验证据[J].农业技术经济,2021(1):61-76.
- [25] 程令国,张晔,刘志彪.农地确权促进了中国农村土地的流转吗?[J].管理世界,2016(1):88-98.
- [26] 孟晓志,李尚蒲.农地确权对劳动力转移性别差异的影响[J].财经问题研究,2022(8):13-21.

Effects of Land Rights Institution Reform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Presenter: LUO Bi-liang^{1,2}

(1. National School of Agricultural Institution and Develop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2.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Summary: The path to China'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eform of the agricultural land Institution.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ousehold responsibility system under the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to the new round of land rights confirmation, and then to the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involving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rural land, household contracting rights, and farmers' management rights, land rights reforms all affect various aspects of farmers' production and life, and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The three articles selected for "A Special Column on Effects of Land Rights Institution Reform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led by professor Luo Bi-liang focus on the incentive effects of land rights on farmers' fertility behavior, the influence of land rights stability on the gender differences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behavioral economics significance of the impact of land property rights stability on farmers' path choice to urbanization. This special column analyzes the functions of land right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agricultural and rural modernization, with the hope of further stimulating academic enthusiasm and deepening research on rural land Institution.

In their article titled "Does Land Rights Stability Strengthen Farm Households' Fertility Incentives: Quasi-Natural 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the Leizhou Peninsula", Hong Wei-jie and Luo Bi-liang utilize farm household questionnaire data and employ OLS and 2SLS methods to investigate this issue. The study reveals that farmers residing in ancestral land exhibit lower birth incentives, and as the proportion of ancestral land in a village increases, the number of new members within farm households decreases. In the article "Land Rights Stability, Informal Governance and Gender Differences Among Migrant Farmers" by Meng Xiao-zhi and Xie Lin, the authors explore the role of clan informal organizations in rural governance and its impact on gender-specific labor migration. Based on data from the 2014 and 2016 CLDS, Weng Yi-qing and Hu Xin-yan's article titled "How Does the Stability of Land Rights Affect Farmers' Choice to Move to Cities?" analyzes the influence of land rights stability on farmers' decisions to migrate to nearby cities using a two-way fixed model. It contributes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based on the county economy.

Key words: land rights Institution; birth incentives; rural-urban migration; nearby urbanization

(责任编辑: 刘 艳)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3.10.002

[引用格式]罗必良(主持人). 中国式现代化的地权制度改革效应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 2023(10): 16-52.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3.10.002-1

[引用格式]洪伟杰, 罗必良. 地权稳定会强化农户的生育激励吗? ——来自雷州半岛的准自然试验证据[J]. 财经问题研究, 2023(10): 16-30.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3.10.002-2

[引用格式]孟晓志, 谢琳. 地权稳定性、非正式治权与务工农民性别差异[J]. 财经问题研究, 2023(10): 31-43.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3.10.002-3

[引用格式]翁艺青, 胡新艳. 地权稳定性如何影响农民的进城选择?[J]. 财经问题研究, 2023(10): 44-52.